



忠诚稳健 厚积薄发

北宋初年,在人才济济的文臣武将之中,吕余庆并不算是特别耀眼的那颗星,尤其是在跟其弟吕端比较之后。吕端可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亮并名,“诸葛一生唯谨慎,吕端大事不糊涂”。吕余庆固然不如其弟成就大,名头响,但他却是吕氏家族在整个宋代枝繁叶茂达到鼎盛的重要奠基人。

在吕余庆之前,其祖父吕尧,五代时期官至横海军节度判官,其父吕琦,也为五代时期大臣,先后在后唐、后晋担任诸多要职,史称其“俊美丰仪,颇有气度”“仁厚宽容”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吕余庆耳濡目染,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。他不急不躁,步步为营,通过自己过人的聪慧和坚韧,深耕细作,厚积薄发,在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特殊历史时期,牢牢站稳脚跟,并不断成长。

从后晋开始,吕余庆因为父荫顺利步入仕途。他的第一个职位名为“千牛备身”,职责就是陪伴皇帝左右,保护皇帝的安全。虽然该职位起点不是很高,但却十分重要,必须是忠诚可靠、素质过硬的青年才俊才能被授予此任。任职期间,吕余庆心无旁骛,忠于职守,兢兢业业,从无纰漏。由于出色的表现,吕余庆不久就被提拔为开封府参军。开封府参军本是一个伍中的军职,类似于行军参谋,但到了宋代,其职能和权限有所变化,是在开封府任较为基层的行政官员,也算正式步入了北宋官员的行列。

《淮南子》有言,“根深则本固,基美则土宁”,树木的根扎得越深,这棵树就越繁茂;城墙的墙基砌得越好,这堵墙就越坚固。吕余庆根基深厚,起步扎实,自然能经得住时局的变幻与人事更迭的考验,他的稳健、韧性、勤勉、果毅以及只看不说的工作作风,都被人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。所以不久,吕余庆又被提拔重用,担任管理民户、杂役、祠祀、农桑的户曹。后晋少帝的胞弟石重睿兼任忠武军节度使时,对吕余庆非常赏识,请他为幕僚,将“推勾狱讼”——负责刑事与判决的推官之职给了他。

由于吕余庆出色的表现,当时还是地方节度使的赵匡胤非常认可他,不只向周世宗举荐鼎力举荐,还干脆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亲信幕僚。宋朝建立伊始,内忧外患,百废待兴,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一大堆,急需得力干将分忧解难。于是,赵匡胤将远在亳州任观察判官的吕余庆召回朝廷,官封给事中,不久,又将首府衙门开封府尹一职给他,意在充分利用吕余庆沉稳和机略的为政作风稳住政权的大本营。

事实证明,吕余庆不负所托,也不负众望,在内部叛乱此起彼伏、外部敌国蠢蠢欲动、风高浪急险象环生的恶劣局面下,他废寝忘食,殚精竭虑,未尝一日得安,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,将东京开封府建成了风雨不透的稳固大后方。

公元960年四月,驻守潞州(今山西长治)的悍将李筠打出后周的旗号,公然与赵匡胤决

重厚简易 长者风范

马军

吕余庆,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重要官员,幽州安次(今河北廊坊)人。吕余庆本名为吕胤,为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,故易以其字余庆为名。吕余庆少有大志,聪敏好学,智略过人。他为人疏朗平和,宁静淡泊,为官忠贞不贰,洁如冰雪,重厚简易,才干殊绝,不争不抢,任劳任怨,颇具长者之风。自后晋入仕之始,吕余庆历任给事中、知开封府、上都副留守、户部侍郎、兵部侍郎、尚书左丞等多职,一直深受信任,宠眷不衰。最后,他在参知政事(副宰相)任上急流勇退,挂冠而去,留下令人赞叹的惊鸿一瞥。

裂,发动叛乱。他联合北汉政权,逮捕北宋朝廷的监军周光逊,派遣军队袭击泽州(今山西晋城),杀掉刺史张福并占领泽州,朝野震动。为鼓舞士气,赵匡胤御驾亲征,在泽州城以南打败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,迫使其自焚而死,晋南叛乱遂平。同年九月,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在扬州举兵反叛,赵匡胤再一次亲率大军征讨。至十一月,宋军攻破扬州,李重进走投无路,举家自焚而死,叛乱平定。在这惊心动魄、血雨腥风的大半年里,吕余庆使出浑身解数上下筹谋、多方运作,令京城民心安定,秩序井然,各项军需物资和粮草给养源源不断运往前方,有力保障了前线平叛的胜利。

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

经过数年的东征西讨、励精图治,新生的北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。公元965年,赵匡胤终于腾出手来,一举将偏安于大西南的后蜀政权化为历史,并且将亡国之君孟昶押到宋庭。先贤早就认识到,马上得天下,但不能马上治天下,依靠武力征服不难,难的是各得其所长治久安。孟昶这个末代皇帝虽然腐败不堪,但其在蜀地经营多年,思虑故主的吏民大有人在,一旦天下有变,死灰复燃,遍地烽火恐怕是分分钟的事。因此,迅速施行对蜀地的有效治理,安定社会秩序,就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刻不容缓的一件事儿。在这种情况下,赵匡胤首先想到的就是忠贞不贰、稳健厚重、果决干练、足智多谋的吕余庆。

吕余庆到达成都后,迅速进入角色,他深知摆在他面前的是异常艰难和险恶的环境,稍有不慎,就可能酿出大变。朝廷安排的架构是这

样的,吕余庆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,主要负责民政管理。还有一支与他并行的人马,这就是朝廷驻军,负责此地的防务,由王全斌负责,手下还有王仁贍、崔彦进等将领。文武各管一摊,互不节制,这就需要吕余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,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王全斌等宋军的关系,以争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。

可是实际情况比吕余庆预想的要糟糕得多。王全斌等一众将领,不仅不能有效节制手下军兵,反而恃功不法,胡作非为,竟然擅自打开后蜀府库,把本该上缴国库的财富肆无忌惮地装进自己的腰包,还纵容属下扰乱市场,强抢民女,“豪夺子女玉帛,及擅发府库,隐没货财”。本来是维护稳定的支柱,却比土匪的破坏性还大,王全斌等人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蜀地民众的强烈不满,域内人心浮动,家家惶恐不安,暴力反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可以想象,吕余庆的施政会受到多少掣肘,审时度势在前,深谋远虑在后,吕余庆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:

以菩萨心肠,惠民安民,安抚好蜀地官吏和黎民百姓。吕余庆宣布,蜀地官吏凡是愿意随孟昶入京的,朝廷给他们留出官位,并建好房屋。废除后蜀时期各种烦苛的税赋和杂役,切实减少税役,自965年始,连续四年蜀地夏租减半。降低盐价,确保百姓能够买得起食盐,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求。对于战乱中的盗贼,吕余庆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自首,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以霹雳手段,猛药治疴,属下官吏借巡查之机寻衅滋事、勒索财物、扰民害民的行为一经发现,则严惩不贷,对驻守宋军擅出军营、危害治安的行为也绝不姑息。一天,某军校趁酒醉之机,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持刀抢劫商人财物,此举不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,也

是对北宋新任知府不遗余力治理蜀地的蔑视和挑战。接到举报后,吕余庆毫不犹豫地立即命人将其逮捕到府衙,当众斩杀。手起刀落,令行禁止,这些平时无法无天的军校们受到极大的震慑,再也不敢随意践踏律法。从此,魑魅胆寒,收手敛迹;百姓安心,五业复兴。

担任成都知府的三年来,吕余庆施政宽简,劝课农桑,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,稳定社会秩序,逐步使满目疮痍的蜀地呈现一派祥和的烟火气。吕余庆的辛勤付出和卓越的治理才干,令蜀地吏民心悦诚服,朝野上下,无不赞叹有加。吕余庆的有效治蜀方略为一众后继者所效仿,这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吕端。

975年,宋朝深陷江南战事,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被动,朝廷决定派使臣稳住北方的契丹,可是却无人愿意出使,因为皆知契丹乃虎狼之邦,杀害使臣之事屡屡发生。就在这一僵持阶段,吕余庆举贤不避亲,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吕端。很多人都以为吕端不过是一酒囊饭袋,干不了什么事。赵匡胤因为无人可派,只好同意任用吕端。吕端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使契丹,凭着满腹经纶,处变不惊,折服契丹君臣,最终不辱使命凯旋,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。不久,吕端升任知成都府,他的施政风格极其类似吕余庆,深得蜀地吏民之心。

胸有丘壑 淡泊名利

吕余庆外表疏朗平和,水波不兴,内里则是胸有丘壑,智略过人,因此,年纪轻轻的他就已颇具实力,极具名声的幕僚了,就连当时的周世宗柴荣对吕余庆都有深刻的印象,任他为掌书记。北宋建立之后,原后周宰相范质为赵匡

诗人们的冬至情怀

王利娟

冬至,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一个重要节气,这一天,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,所以,古代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讲法。在这个重要日子里,无数文人墨客把自己人生的感悟,写入一首首经典的冬至诗词中。

白居易笔下的冬至是思家的。他在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中写道: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冬至这天,漂泊在外的诗人,正好夜宿邯郸驿舍。他看着处处家人团聚、欢声笑语、节日庆祝的热闹景象,而自己形单影只,只有孤灯相伴,倍感凄凉。诗人此刻十分想念家人,可他偏偏不说自己想念家人,而是说家人应该直至今夜,还围坐在灯前,思念着自己这个远行人吧。真可谓无一字提“思家”,处处含思家之情。

陆游笔下的冬至是孤独的。宋宁宗嘉泰元年(1201),七十七岁的陆游,已经离开官场回到了山阴老家生活。这年冬至,他看着冷冷清清的冬至,写下了《辛酉冬至》:“今日日南至,吾门方寂然。家贫过节,身老怯增年。毕祭皆扶拜,分盘独早眠。惟应探春梦,已绕镜湖边。”诗中的“日南至”即是指冬至。诗人虽然为官多年,可惜一直不得重用,所以积蓄不多,家境颇为贫寒。到了冬至,也不能像别人家一样隆重地庆祝,只能“轻过节”。再想到自己年事已高,每到冬至就又将再添一岁,更是让人感慨时光易逝,岁月蹉跎。诗人用“分盘独早眠”来描写自己过冬至早早睡去的情景,和周围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,孤独感更甚。

苏轼笔下的冬至是超凡脱俗的。“井底微阳回未回,萧萧雨湿茱萸。何人更似苏夫子,不是花时肯独来。”苏轼在《冬至日独游吉祥寺》里记录了自己冬至游吉祥寺的感人。吉祥寺,是宋代名刹,因牡丹而闻名。花开时节,文人墨客纷纷前往赏花作赋,无比热闹。而此时,正值冬季,虽然已到冬至,但微阳未回,再加上寒雨萧萧,备受大家瞩目的牡丹也只有“枯菱”。清冷的寺中,也许只有苏轼这样超凡脱俗、特立独行之人才会到訪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,才成就了独一无二苏东坡。

范成大笔下的冬至是充满希望的。“寒谷春生,熏叶气,玉笋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,吉云清穆。”诗人在《满江红·冬至》中开篇即用冬至的典型特征来表明节气变化。冬至是太阳“日行南至,往北复返”的转折点,此后太阳高度回升,进入了新的循环,也常被作为代表着新的一年开始。此时,“冬至阳生”,春意也开始萌动。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,诗人号召大家“休把心机关药裹,但逢节序添诗轴”,即使现在是在强颜欢笑,想想未来,依然是充满希望。

虽然随着时间的变迁,冬至不再如古代那样重要,但品读这些“冬至”诗,感受穿越时光的“冬至”,依然能体会到古人的冬至情怀。

滴水成海 聚沙成塔

王爱军

象,不久就会有祸难发生,到那时再和各位共同完成大业吧!”说完,当即只带了几个随从,便赶赴京城了。

果然,刘或没有为难他,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

三

刘或死后,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了当皇帝的心,带数万精兵奔袭建康,都城一片惊慌。萧道成力主抵抗,在都城的外围新亭构筑工事。战事进行得非常惨烈,叛军一度攻到城下。刘休范战死,他手下的典签为制造混乱,诈称刘休范已攻占新亭。在那种形势下,跑得最快的可能就是谣言了,城内的士人官吏、商贾百姓,为了保全性命,或是争相抢先站队,纷纷跑到新亭的军垒前投上名片,表达效忠之意。

望着眼前成堆的名片,萧道成的手下很高兴,毕竟人海茫茫,找出谁是奸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现在他们自投罗网,自然不能轻易放过。

萧道成摇头说,“大难临头,怕死不过是人性的天性,不必过于追究。”他命令把这些名片全部烧掉,然后列队登上城头,对那些投奔来的人说:“刘休范父子前日已被杀死,尸体就在南冈下。我便是萧道成,各位好好看看。你们递上来的名片我都烧掉了,不必担心。”

众人一听,吓得脸都变了色,可看到自己投上来的名片真的化成了灰烬,这才放下心来。

战事获得了胜利,萧道成率领车队凯旋,沿途百姓夹道欢迎,议论说:“正是这位大人保全了国家啊!”

四

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叛,朝中重臣袁粲等都参与了谋划。袁粲的典签莫朝祖事先知道了他们的阴谋,但没有主动举报。萧道成得知后,把莫朝祖召到了自己的帐前。他口气严肃地质问道:

“袁粲谋反,你为什么不报告?”莫朝祖神色淡然,平静地回答说:“服侍主人,义无二心,即使死也不敢出卖主人。”

萧道成不禁点头称赞,当即赦免了他的罪过,将其官复原职。

将军黄回驻后新亭,听到石头城那边战事打响,便率兵过来协助袁粲。朱雀桥有守军,命令他返回驻地,按照职级,黄回应受节度,他也没听,带领部队连夜开到了石头城下,可等他到了那里,叛乱早被平定了。

黄回很尴尬,便谎称是赶来平叛的。其实萧道成早就知道他跟袁粲勾结的事,可他并没有当面揭穿,而是对他加以安抚,继续让他担任将军之职,并且派他西上与叛军交战。

黄回感激之情溢于言表,与萧道成道别时,更是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

五

萧道成很有才华,尤其擅长书法和围棋。

他对自己的书法水平很是自负,有一次,他在朝堂上与南齐著名的书法家王僧虔比试书法,两人各书了一幅字后,萧道成问王僧虔说:“朕与公卿书法,谁是第一?”王僧虔从容回答说:“臣书第一,陛下亦第一;臣书为群臣中第一,陛下书为帝王中第一。”萧道成听了,哈哈大笑。

萧道成还酷爱下棋,他玩什么都很投入,曾有二卷本《齐高棋图》问世,足见其围棋水平。有一天,他召直阁将军周覆、给事中褚思庄进宫陪他下棋。与周覆对弈,二人杀得难解难分,有一个劫争难住了萧道成,他陷入了沉思。一会儿,他若有所思地拿起棋子,放在了棋盘上,几乎是同时,他又突然意识到不妥,立刻拿了起来。此刻周将军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棋盘呢,一见皇帝悔棋,不干了,情急之下,一把抓住了萧道成的手,要把那粒棋子抢出来。旁边侍立的臣子们吓坏了,马上大声喝止周覆,随即要求给周覆个大不敬之罪,杀了他以儆效尤。萧道成笑着摆手,“玩儿罢了,怎么能当真?”

在历史的转折关头,似乎人人都面临着机遇,但结果却常常令我们失望,于是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,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?人们常说,一粒沙里藏着一个世界,一滴水里折射出一片海洋,萧道成能从一普通人走上皇帝的高位,或许答案就在这些细节当中。

语词精奥

“男女授受不亲”是怎样演变的

许晖

男女授受不亲:授,给予;受,接受;不亲,男女之手不能接触。这句话的本义是男女之间不能手递手地传递东西。

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语出自《礼记·坊记》:“子云:‘好德如好色。诸侯不下渔色。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。男女授受不亲。’”

孔子在《论语·子罕》篇中说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,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就像爱好美丽一样的人;诸侯不下渔色,诸侯如果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娶妻妾,譬如渔人撒网捕鱼,网中的鱼当然全部归属渔人所有,因此要对国君的这种特权加以限制,只能娶别的女人的女人;因此君子要远离美色,以此作为人民的准则。

前三句中都有一个“色”字,在这个基础之上,要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,生怕男人被女人之“色”所惑。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礼制写照。

关于“授受不亲”,《礼记·内则》中还有具体的规定:“非祭非丧,不相授器。其相授,则女受以篚,其无篚,则皆坐奠之,而后取之。”“篚”是圆形的盛物竹器。除了庄严的祭祀和合体的丧葬等场合之外,男女之间如果相授东西,女方必须用篚承接,如果没有篚,那么双方都要坐下,把东西放到地上,然后女方才能取走。

此外还有许多非常苛刻的规定,甚至一家之中,男女都不能杂坐在一起,不能把衣服挂在同一个衣架上,不能使用同一套盥洗用具,女子出嫁后回家,兄弟不得与之同席而坐,同器而食。

但是,同样是儒家宗师,对于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苛刻规定,孟子却有不同意见,《离娄上》一篇中记载了他和淳于髡的一段对话。

淳于髡曰:“男女授受不亲,礼与?”孟子曰:“礼也。”曰:“嫂溺,则援之以手乎?”曰:“嫂溺不援,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,礼也;嫂溺,援之以手者,权也。”

孟子认为“男女授受不亲”固然是礼的要求,但是嫂子溺水的时候必须援之以手,否则就是豺狼。这是对于礼的“权”(变通)。

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,孟子的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但是到了后世,尤其是宋代理学之后,“男女授受不亲”发展到了变态的地步,与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一样成为吃人礼教的代名词。